

美国学：学科成长与中国意义

赵可金

【内容提要】美国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从20世纪初起步，迄今已经成长为一门涵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交叉学科，体现着美国文明独特的主体精神和价值追求。然而，美国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困惑，学界在学科定位、学术主题、研究方法论和学术社群等方面各执一词，鲜有共识。尤其是美国之外的美国学研究更是无法摆脱挫折感，美国学不过是向本国介绍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展开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对中国来说，突破现有美国学研究困境的一个途径是加强问题意识，淡化学科意识，加强比较方法，走中层理论的道路。

【关键词】美国学 问题意识 中层理论 中国意义

【作者简介】赵可金，男，1975年生，现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胜因院27号，电话：010-62794307，13811607689，电子信箱：kejinzhao@tsinghua.edu.cn

American Studies: Growth of the Discipline and Its Chinese Implications

Kejin Zhao

[Abstract] American Studies is one of young disciplines in Americ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 century, American Studies has become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ith prominent character which contain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mbodies American's special subject spirits and the concern of social values. However, there are even a lot of paradoxes and deep controversy, such as discipline positioning, research topics, methodologies and academic community, among scholar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udies. In particular, the American studies abroa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efinitely never been extricated themselves from feeling of frustration. And their tasks will not beyond the introducing American scholars' research products to mother country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push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studies. For Chinese scholars, the effective way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present dilemma in American Studies is to weaken the sense of discipline, strengthen the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and persist in the approach of middle range.

[Key Words] American Studies/Sense of Problem/Theory of Middle Range/ Chinese Implications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自美国建国以来，在区区两百年时间内，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关于美国成功的秘密早已引起包括美国学界在内的全世界学界的关注，从不同的学科、众多的领域和各个

角度对美国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有固定学术阵地和交流平台、确立了比较鲜明的研究主题、成功地实现向国外拓展的新兴学科。[1]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美国卷入世界程度的加深,来自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美国学者和美国观点主导的美国学传统形成了挑战,所谓重新世界化美国(Re-worlding America)和重新定位美国学(Re-situation American Studies)的讨论日益热烈,美国学研究面临着凝练学科和重新定向的新课题。[2]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鉴于美国学界的美国学研究与其他国家的美国学研究在范畴上存在着高度的不对称性,[3]同时,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对世界未来的巨大影响力,此种情况合在一起,更加强了思索美国学学科发展方向及其对其他国家意义和影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在明确界定美国学的学科内涵和成长的基础上,对美国学发展面临的学术困境和未来思路进行分析,并思考美国学发展对中国美国研究的意义,以求教于方家。

美国学：学科与事业

一项成熟的学科必须矗立在一系列独特、精确、严格和科学的概念基础上,美国学也不例外。迄今为止,尽管学界有大量关于美国学的概念界定,但在指称对象、涵盖范围、关注议题和学科归属上尚无统一的看法,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争论,这些争论已经严重影响着美国学学科的发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均是如此。[4]归结学界关于美国学概念的界定,可以发现彼此之间的分歧是多重的、复杂的。

首先,关于美国学研究最为明晰的分歧是所谓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和对美国的研究(the Study of America)的分歧。蔡翠红和倪世雄认为,美国学有不同的含义,美国学在本土的展开是一种面向自我、内向式的研究,它体现了强烈的美国性、民族身份诉求或者美国特质,是一个仍在不断拓展的多元领域,美国学是美国性和美国特质的寻找过程,是一内向的文化研究;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研究则集中于对一强大的他国的研究,较易倾向于政治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研究。[5]在两位学者看来,美国的美国学研究更多是一种美国研究,比如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执行主任斯蒂芬斯就认为,美国学是“旨在促进从宽广的人文意义上理解美国文化的过去与现在的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6]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研究更多是一种对美国的研究,比如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认为,美国学亦即美国研究,是一门针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专门研究并探索其行为规律性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从本质上来说,美国学是研究美国国家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学问,从内容上来说,美国学是研究美国文明的学科。[7]可见,美

国的美国学研究和其他国家的美国学研究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它们在开展美国学研究的时候,可能并非强调同一个对象。

其次,即便是在美国研究内部,也存在对美国学的整体主义研究、对美国的不同定义的研究的区别。关于整体主义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美国研究的开山鼻祖帕灵顿,他在其被公认为美国研究奠基之作的《美国思想的流派》一书中说得明白:“我试图描述在美国文化中某些被认为是美国传统所特有的根本性观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它们是怎样在这里诞生的,它们是怎样受到反对的,它们对决定我们特有的理想与制度的形式和范围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8]这一看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比如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的看法,他笼统地认为,美国学研究作为整体的“美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文化是“主观经历的组织方式”。[9]在比如研究美国学运动的权威吉恩·怀斯(Gene Wise)认为,美国学是通过对美国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以揭示和论证美国精神的历史连贯性和社会一致性。[10]罗伯特·斯皮勒直接认为,寻求美国学单一方法的愿望源自于一种要寻找出研究对象本身内在的有机一体性的愿望。[11]显然,在这些学者看来,美国学是一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学科。然而,20世纪中叶之后,对美国学的整体主义看法受到了一系列学者的批判,比如艾奥瓦大学的理查德·P·霍维茨(Richard P. Horwitz)则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界定,认为美国学的研究主题可以概括为各种群体对美国的不同定义,定义的内涵决定于历史发展和群体情感。[12]归根结底是不同美国之间的争论。

另外,在具体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就更多复杂和多样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美国学更关注美国的国民性格、区域文化、思想传统等因素,在研究主题上更多关注美国的历史和文明,力图寻求对美国进行文学和历史结合的整体主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突出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派瑞·米勒和F·O·马西森的研究是其突出代表。[13]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学研究转而关注性别、种族、宗教、阶级等文化因素的研究,研究主题关注以社会意识为基础的美国思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比较方法、行为主义方法、批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方法,阿伦·特拉奇滕伯格(Alan Trachtenberg)的阶级分析、戴维·R·罗迪格(David R. Roediger)的种族分析以及各种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等,都是集中的代表。[14]如果具体到每个学者之间的研究,彼此的复杂和差异就更加多样了。

从美国学研究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出发,以研究美国学运动著名的四川外语学院张涛教授没有对美国学做出笼统的界定,而是从美国学构成的角度,指出了美国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支撑美国学的基本构件有四个:一是美国学研究美国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群体特色

的集体和个人文化意识,这些意识汇聚成了美国的文化传统。二是美国学在实施这些研究时,经常以美国社会中某一群体的代表人物的代表著述或经历为切入点。三是在方法论上,美国学多以跨学科的方式出现,对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进行选择利用。四是美国学受时代氛围的影响较强,其发展因此呈现出从宏大叙述到细化研究的发展脉络。[15]但是,这一看法显然是过于看重美国学的复杂性,在强调美国学细节的同时,不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为此,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有中教授对美国学提出了一个较为宏观和明确的定义,他认为,美国学是一门探索 美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即 美国的历程 的学问,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美国历史研究,而且包括对美国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的考察。[16]孙有中教授的看法非常清晰简洁,突出了 文化、历史、现状 的多重向度,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关照,也具有开放的分析向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对美国学比较不错的界定。此种界定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突出美国学的美国性,将美国学沦为一般意义上的 美国研究,没有揭示出美国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基础地位和美国学学科所内在于的理想和激情,不利于学界把握美国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学科动力和源头活水,也不利于揭示美国之所以迅猛发展的精神支持和学科根源。

美国学既是关于美国的一门学科,更是关于美国的一项事业,其学科性和实践性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从学科性上来说,凡是与美国相关的学问,都可以算作是美国学的内容,比如严维明先生认为,美国学,或称美国研究,是一门把美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凡研究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外交,以及一切与美国有关的课题,均属美国学。[17]从实践性上来说,美国学也是美国人实现其理想和事业探索历程的学问,反映着美国与众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在斯蒂芬斯看来,美国学的研究目的在于“理解我们自己”。在马西森看来,美国的文学是 民主的文学 。[18]在亨利·N·史密斯、利奥·马克斯等人看来,美国学就是一系列美国人的 神话 和 象征 。[19]詹姆斯·西瑟认为,美国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应从事支持自由民主政体的活动。”[20]可见,在界定美国学的时候,既不能弱化其学科性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其事业性的一面,必须兼顾两者,才能把握美国学研究的全貌。

如果从兼顾学科性和事业性的双重考量出发,美国学归根到底都是对美国民族特性、国家特征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历程。从纵向的历史事业来说,美国学是来自全世界的移民先是在北美大陆随后是在世界范围内探索实现美国理想的历程,是一批批美国人获得自我精神和自我发展的经验结晶。迄今为止,这一探索历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美国从欧洲大陆的强权和母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的 山巅之城,并实现了 美洲是美洲人的

美洲；二是美国克服了从乡村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通过南北战争、进步主义、罗斯福新政等一系列改革，构建了一个新美国，实现了民主化和社会和谐；三是美国当下正在探索的如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努力解决美国和世界的矛盾，塑造一个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这一任务尚未完成，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从横向的学科构成来说，美国学涵盖了三个领域：一是对美国人的研究，集中于民族特性及其价值的研究，力图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怎样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人的问题；二是美国国家研究，关注国家特征及其过程的研究，着力回答美国人所缔造的国家是如何可能的、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以及怎样才能为其他的旧大陆创造可以效仿的国家样板等问题。三是美国社会研究，尤其关注理想和秩序的研究，努力寻求化解社会冲突和实现美国理想的济世良方。无论隶属哪一个学科，只要力图推进美国学的研究，都会围绕上述内容从各自的视角展开研究，最终会殊途同归，汇入美国学研究的汪洋大海。

美国学：历史与范式

美国学是学科分化之后为满足美国民族精神需求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反动。尽管美国研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1837 年爱默生向哈佛知识界发表的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在演讲中，爱默生号召美国学者摆脱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创建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美国文化。但是，系统的美国学在 20 世纪之前却始终没有形成，甚至连“美国学”一词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的美国英语中都很难看到。[21]学界公认美国学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对形式主义的反动（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最能够称得上是“美国学的思想之父”的是弗农·路易斯·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在 1927 年出版的《美国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一书中，帕灵顿将美国文化的整合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将爱默生的“美国学者”变成了现实，作为一门独特学问的美国学确立了思想基础。[22]随后，1931 年耶鲁大学开设“美国思想与文明”课程，1933 年该校授予第一个美国文明史方向博士学位，标志着美国研究的诞生。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全美国多达 261 个系/专业开设美国研究课程，研究方向涉及文学、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和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学等社会学科。[23]

回顾美国学学科成长的历程，按照美国学事业的纵向线索和美国学学科的横向指标为依据，可以将美国学的学科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24]：第一阶段是帕灵顿、马西森和米勒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新教运动范式，主要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第二阶段是亨利·史密斯、刘易斯和马克斯等人所代表的神话-象征范式，主要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以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范式。

第一阶段是美国学的奠基时期：帕灵顿范式

美国最初起源于欧洲在北美的移民垦殖殖民地，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上带有极强的欧洲色彩，毋宁说美国学的开拓最初就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在北美大陆的延伸。受欧洲大陆哲学和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从殖民地开拓一直到 19 世纪末的 200 多年时间内，美国一直延续着欧洲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在学术上饱受形式主义（formalism）的制约，决定了美国学界长期保持着欧洲学术的风格。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的学术无法摆脱来自欧洲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教群体（WASP）主导者美国的思想和学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学的起源本身就是一场通过批判欧洲思想传统而追求民族主义倾向的学术运动，也是美国学界对欧洲学科隔离传统反叛精神的结果。[25]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实现政治独立的美国，在思想领域一直在谋求精神独立，寻求美国学的主观努力一直没有放弃过。尽管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为美国独立战争解决了合法性问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等思想家的著作作为美国政治缔造了新的基础，但是美国在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摆脱欧洲学术传统的轨道，仍然保持着欧洲自由主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总体特征，完整意义上的美国学并没有生根发芽。之所以缔造美国学的强烈动机无法开花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的自由主义在新大陆仍然一帆风顺，没有遭遇大的挑战和危机，美国学的学科成长仍然缺乏客观基础。

美国学发展的客观基础来自于 19 世纪中后期北美工业化的浪潮。西进运动后，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来自中东欧移民浪潮的兴起，打破了乡村社会的节奏，无论是物质生活领域还是精神生活领域，都引发了一场革命。从物质生活领域来说，经济领域中的垄断、生产领域的产品质量问题、城市生活中的失业和流浪以及政府中肆虐的腐败，习惯于自足、平等的乡村农业社会的人们无法适应以分工和依赖为特征的城市工业社会，在客观上令自由主义陷入心理错位和价值危机，进一步引发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从精神生活领域来说，人文学科研究主题的非美国化、高校的地方主义倾向、学科隔离以及学科过于精细带来的弊端引发了一场旨在增进学科融合、全方位研究美国特定的美国学运动。[26]以詹姆斯·哈维·鲁滨逊为代表开创的新史学改变了美国历史学以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传记为主的研究传统，开辟了将思想意识与历史结合起来的新史学道路，与文学领域对形式主义反抗的反叛者合在一起，产生了最初的美学。[27]在这一过程中，弗农·路易斯·帕灵顿在《美国思想的主要流派》、F·O·马西森在《美国的文艺复兴》和派瑞·米勒所创立的以美国式自由主义思想与新教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帕灵顿范式成为美国学诞生的标志。

面对工业化时代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威胁，无论是帕灵顿的思想史模式，还是马西森的文学模式，还是米勒的清教模式，都强调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改造。帕灵顿以法国浪漫主义思想为依托，在不否定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公正、权力分散和农业至上等自由主义内容，对杰弗逊的思想充满崇敬。[28]相比帕灵顿关注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马西森更关注知识精英在自由主义遭受挫折时的内心世界，更注重人格完整的境界，追求社会公正、怀念农业生活模式、主张政治民主是马西森笔下美国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29]不难看出，尽管两人思想不仅相同，但追求民主、公正的自由主义是其共同的理想，这是一种农耕文化的价值观。这一对人性、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呼唤有助于此后美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成长，政府对自由的干预越来越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内容。米勒对清教的研究将美国学推进到美国人的精神世界，认为清教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其本来特性逐步消失，最终完全融入美国世俗历史进程之中，源自欧洲的一派宗教思想转变成美利坚民族的自由、民主、宪政信念，世俗化后的清教开始主张社会公正、民众权利和北美的特殊性，清教从一场欧洲宗教运动转变成北美的思想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和外交运动。[30] 尽管早期美国研究的思想家们彼此看法存在些许差异，但基本上在美国历程的本质和研究方法论上取得了若干共识，被称之为“帕灵顿范式”，吉恩·怀斯将其归结为五方面的内容：（1）美国存在单一的“美国心灵”；（2）美国心灵扎根于新世界，以满怀希望、充满纯真、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为主要特征与欧洲大陆相区别开来；（3）美国心灵存在于每一个美国人身上，也集中体现于美国主要思想家的论著中；（4）美国心灵是美国思想史永恒的主题，涵盖了新教主义、个人主义、进步主义、实用主义、跨越传统主义等内容；（5）美国学推崇美国的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31]这些假设作为美国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成为学界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共享的范式。在方法论上，早期的美国学研究看重历史和文学的结合，看重思想史研究，认为只有从思想反思和自我剖析中寻找美国特性和民族意识的根源。帕灵顿范式解决了“美国为什么与众不同？”的问题，但并没有回答“美国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尤其是缺乏能够涵盖人、国家和社会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仅仅从思想史、文学和宗教领域确定了边界，至于边界内的美国内涵还没有做出回答，这一任务留给了美国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美国学的成熟时期：神话-象征范式

从进步主义到罗斯福新政，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基本解决了从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心理错位问题，但美国在文化心理仍然十分不安，南北战争导致的文化记忆阴影始终萦绕不散。特别是二战后大量欧洲中东部移民涌入美国，建立了大片的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移民区，加之种族、妇女、移民等多元意识的崛起，关于“我们是谁？”的身

份困惑日益成为美国学面临的主要矛盾。 界定美国性格、找出南北文化的共性便成了五六十年代美国研究的首要任务。 [32]为此，以亨利·N·史密斯 (Henry Nash Smith)、R·W·B·刘易斯(R. W. B. Lewis)、利奥·马克思(Leo Marx)和阿伦·特拉奇滕伯格 ()、查尔斯·菲德尔森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确立了“神话-象征”范式，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心灵与美国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寻求美国学的独特身份特征。神话-象征范式认为，在美国文化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某种能够凝聚美国社会意识并能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根本特质，这些特质就是在美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某些神话 (myth)、象征 (symbol) 与母题 (motif) 。 [33]通过这些神话、象征和母题，美国学将美国心灵与多彩的现实历史进程链接起来，构成了美国人独特的经历和身份认同的载体。

对美国进行“神话-象征”范式研究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特纳 (Frederick J. Turner) 在 1893 年提出的边疆学说。特纳目睹了美国边疆开发的历程，对边疆和美国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有独特的感悟，在 1893 年发布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以及几十年发表的《区域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等文章中，特纳坚持认为边疆开发塑造了美国的特性，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等美国精神产生于西部边疆开发过程中，而非源自欧洲，美国文明绝不是欧洲模式在美洲的翻版。 [34]特纳的边疆学说将美国学文化意识的主导权争论纳入学术话语体系，开辟了美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而非移植而来的美国的学术方向，从农耕生活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和富足升华为社会理想，确立了一个美国的边疆神话。

特纳从美国历史中提炼学术范畴的做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引发了一批学者的关注。亨利·N·史密斯沿着特纳关于西部边疆开发的历史，考察以政治家和冒险家为主体的拓荒者探险历程，在 1950 年出版了《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史密斯发现，在美国向西推进的历史中，逐步确立了“帝国神话 (Myth of the Empire)”和“花园神话 (Myth of the Garden)”。所谓帝国神话，是指美国政治家和探险家在“天赐使命”的激励下，向西推进的大陆扩张，穿过阿勒格尼山脉的隘口，跨越密西西比河流域，翻越远西部的高山平地 and 崇山峻岭，最终达到太平洋海岸。将新的土地纳入美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帝国范围的过程。所谓花园神话，是指美国拓荒者对占领的西部土地进行开垦，建成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世界花园，他们在处女地上握耙扶犁，播种庄家，辽阔的内陆河谷变成一座花园：想象中的世界花园。 [35]在史密斯笔下，帝国神话的政治扩张和花园神话的农业开发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完全是美国西进运动时已经远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群体记忆，此种记忆是惟有美国才有的经历，不可能是欧洲的产物。

与史密斯追寻远去的群体记忆不同,刘易斯关注的是对欧洲旧传统的批判和对美国新传统的培育。刘易斯在 1955 年出版的《美国的亚当:19 世纪的纯真、悲剧与传统》一书中,针对美国 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 的东部地区 19 世纪初期兴起的乐观主义文化情绪,刘易斯从文学领域中的希望派、记忆派和反语派争论中发现美国人有一种返璞归真的 亚当理想,这一理想激励美国人敢于摒弃欧洲传统,缔造 新伊甸园 的美国传统,做创造新传统的 美国亚当,这是一位 新冒险英雄,一位已经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愉快地摆脱了祖辈束缚,未被通常的家族和种族所触及和腐蚀的人;一位孑然一身、自立自强、时刻准备用自身的独特力量面对一切挑战的人。 [36]这一理想是东部人集体辩论形成的 本土神话。刘易斯的 美国亚当 神话仍然是以美国本土的生活方式和制度为支柱的,赋予美国一种崭新的身份认同和形象标识,但由于刘易斯更多着眼于文学领域,至于美国社会领域中是否认同这一神话,仍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史密斯的学生里奥·马克斯在 1967 年出版的《花园里的机器》一书中进一步考察了美国西部代表的田园理想 (Pastoral Ideal) 与东部机器大工业代表的现代社会之间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冲突,机械时代打破了 绿树环绕的隐居之地 的宁静,田园理想所极力恢复的是农耕生活中那种简朴、和谐和贴近自然的生活,充满对 曾经未被玷污的绿色共和国形象以及林木环绕、村落散布、阡陌纵横并致力于追求幸福的宁静之所的怀念。 [37]在马克斯看来,美国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田园理想和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一起,构成了美国区别于欧洲的最突出特征,使得田园理想对美国人特别具有吸引力。面对欧洲传入的机器大工业、工厂制度和城市社会,几乎 从杰斐逊时代开始,美国理想的根本实现形式就是乡村景观,即被修整得井井有条并将扩展到整个大陆的绿色花园。 [38]不难看出,对农业以及散居的生活方式的憧憬升华为美利坚民族的神话,也构成了美国身份认同的最基础象征。

尽管史密斯、刘易斯和马克斯等在关注重点和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共享神话-象征范式,都是对美国特殊经历的提炼和整理,也都坚持农业主义和工业主义冲突的辩证思维视角,都倾向于认定美国理想的本质在于回归自然和乡土生活方式,在研究方法上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以 原则性的机会主义 为美国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广泛借鉴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39]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学已经步入成熟阶段,学科范式和研究社群已经趋于重合。当然,神话-象征范式也存在深刻缺陷,这一过分偏重学科基础的范式,反而相对忽略了作为美国事业的历史和社会多样性维度,忽视了美国种族、性别、阶级等多样性社会因素的研究,更多从人文学科中汲取营养而忽视从社会学科中吸纳资源,将美国学引入了一个相对狭隘的研究领域。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多元群体意识的觉醒,

这一范式的美国学越来越无法适应现实的要求和挑战。

第三阶段是美国学的反思时期：后现代-文化批判范式

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所致力于的“美国例外论”受到了来自各个领域的挑战，各种形式的政治反叛、大学里的民众抗争、城市骚乱、反越战运动升级、反文化潮流等，犹如将美国带入了一个批判一切的文化颠覆阶段。受现实社会领域和欧洲思想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的冲击，美国学进入了自我反思的时期。在这一反思时期，美国学步入了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轨道，注入黑人研究、通俗文化研究、民俗研究、妇女研究、生态研究、电影研究、种族研究、物质文化研究、教育研究、青年研究、第三世界研究以及美国土著研究等纷纷进入美国学研究的视野，美国学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特征：重视文化的人类学定义，注重社会结构、自我反省、多元化趋势，注重对个别现象的研究，关注文化经历的覆盖面而非本质。 [40]在此种反思过程中，美国已经很难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进行研究，精英研究和经典作品研究已经不能作为透视美国的有效窗口，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内容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范围，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为主要内容的所谓亚文化研究 (sub-cultural studies) 迅速扩散，美国研究面临着“碎片化”的问题，研究者的主观阐释动机和自我反思成为美国学关注的重心。 [41]

受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影响，阶级分析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只不过美国学的阶级分析不再把阶级看作是经济决定的产物，二是以社会经历和文化意识划分阶级，以阶级分化考察美国文化。在这方面为学界公认的代表作是阿伦·特拉斯滕伯格的《美国的公司化》和戴维·R·罗迪格的《白人的身份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特拉斯滕伯格看来，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对美国的认识是相互冲突的，此种冲突更多在文化层面展开，关于美国本身的意义是争论的焦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新的等级控制机制、与过去不同而结构更加紧凑的社会”，其中，社会中上层在决定美国的内涵中处于主导地位，被动接受者则构成了反抗力量，劳资冲突从根本上是一种文化冲突。 [42]相比特拉斯滕伯格聚焦于阶级的文化分析，罗迪格则将种族、阶级和话语权的分析融合到了一起，考察了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种族主义的发展，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是在文化意识中对有色种族部分程度上的容忍，而白人工人的种族排斥情绪是贯穿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线索。 [43]将社会关系、阶级和文化意识结合在一起，是新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学的一个贡献，令人看到美国例外论背后复杂的内容。

关于种族和性别的研究，在 20 世纪中叶之后在美国学界蔚然成风，即使是在主流范式主导美国学的时代，关于黑人、性别、移民的研究都顽强地存在着，为赢得话语权进行不懈

的学术努力。最具有代表性的黑人知识分子布克·T·华盛顿关于 对形式的主宰 研究和 W·E·B·杜波伊斯关于 对主权的扭曲 的研究，代表了非洲裔美国人摆脱顺从、赢得尊重的社会地位的努力。[44]除此之外，拉蒙·古提亚雷兹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研究[45]、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为代表的对女性和妇女权利的研究，[46]爱德华·萨义德所引导的后殖民主义的研究，[47]以及近年来兴起关于同性恋、家庭价值、青年教育等研究，将美国研究不断引向亚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了美国研究的内容。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反思时期的美国学更多引入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研究方法，从根本上实现了美国学的转型。新的多学科、跨领域的种种研究方法，已经加剧了曾经成形的美国学的破坏，并不断鼓动一种高度依赖 对分析性的总体化的、对以新的方式进行的使文化总体化的相应的拒绝的对话主义。 [48]在反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美国学研究认为任何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性的动机和后果，强调考察各种话语文本背后的权力动机，进而导致美国学研究对象进一步碎片化、研究队伍进一步多元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多学科化。一句话，美国学向着无所不在的研究空间迈进。

回顾美国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学是美利坚民族的寻根之学，美国学认为美利坚民族的根基在文化，任何其他的美术学研究都服从和致力于对美国文化根基的思考和探索。从美国学的历程来看，最初美国学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若干思想流派为研究对象，后来以抽象的和超时空的神话和象征为主题，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对多元社会文化的研究。无论哪一种研究，都体现了美国学对美国之文化根基的学术关照，体现着美国文明独特的主体精神和价值追求。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冲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摆脱自己的血脉根基，否则就会在世界文化激荡的汪洋大海中迷失自己的方向。美国学就是美利坚民族在世界文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的灯塔，为美国航船指引方向，这也许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一个根源。

美国学：问题与目标

从美国学不到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美国学是多学科对话的跨学科平台，也是人文与社会科学交融的综合研究平台。在多学科对话中，美国学试图理解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加勒比海、中东及拉美地区的移民，试图从多样化的文化碰撞和冲突中确立一套给美国生活提供意义的共享的信仰、行为与符号系统。因此，美国学的最终意图是给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确立存在意义的价值系统和精神家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国学初步实现了这一意图，无论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项事业，美国学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

美国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困惑，学界在学科定位、学术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社群论等方面各执一词，鲜有共识。

在学科定位上，美国学仍然存在多元主义的整合困惑，仍然存在“我们是谁”的困惑，仍然缺乏完整、统一、完善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最初，美国学只不过是作为文学和历史课程的延伸，几乎很少有人感觉到一个新的课程或者新的学科正在形成之中，充其量不过是

美国的（The Studies of America）的研究，而非“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49]后来尽管明确了美国学是关于美国文明的学问，然而究竟美国文明涵盖哪些范围，在学者们中间却鲜有定论。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文明主要是包括对艺术和艺术家、对知识分子和思想等“高级文化史”的研究，有的则更多集中于美国历史和社会的现实研究，还有的将研究放宽为所有社会生活方式。[50]尤其是随着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亚文化研究的崛起，每一种研究路径都寻求操控美国文化的主导权，从总体上解构了此前刚刚达成的“神话-象征”范式，美国学成为不同美国定义的竞争之学。[51]面对来自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宗教学、艺术等众多学科的挤压，作为交叉学科的美国学应当置于何种地位，的确难以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移民浪潮的重新兴起，大量的拉美裔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引发了严重的族裔国家认同危机，美国学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里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族认同是每个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坐标，直接影响任何国家的内部社会和谐以及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国家认同正陷入一场认同危机中。在美国，具体表现在不同民族成分及其文化与美国主流文明的互相颉颃与渗透，他们不但不被同化，反而使美国面临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52]亨廷顿对美国的担心不无道理，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全球多元文化共处于同一个宪政体系下，必然会产生不同文化的矛盾、摩擦、冲突等“消化不良”的问题。面对此种多元主义的挑战，美国未来的根基在何处？的确是美国学面临的一个尖锐课题。

在学术主题上，美国学缺乏系统化的学科隶属逻辑，往往泛泛地寻求对自以为是的文化现象的研究，缺乏学术使命意识和理论关怀。任何一门学问都必然有自己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比如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资源有效配置，政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平衡社会矛盾，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等。相比之下，美国学向来缺乏核心的学术主题，尽管美国学关注美国文化的历史问题，但对于美国文化的涵义却缺乏共识。有的认为美国学研究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美国文化，有的则认为美国学研究作为一个地理单元的北美大陆的文化，还有的界定为一个文化集体而在这个地区定居、发展起来的人民的文化。[53]由于对

美国文化的认识不一致，导致对美国学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十分模糊。亨利·N·史密斯的看法非常能代表美国学在学术主题上的模糊特征，他认为，美国学就是要加深对美国文化的理解，除此之外，别无他意。但如果文化的定义就是主观经验如何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话，那么剩下的就是去发现是谁在进行这种组合的，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成分被组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以及如何研究此种组合出来的结果。[54]问题的关键是，当人们对美国文化的理解不一致时，所有的研究努力都有可能沦为 聋子的对话 ，难以形成共同的学术关照和研究共识。从美国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的文学与历史研究更关注如何摆脱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主义以及历史研究中的政治史倾向，致力于揭示美国思想传统，对于美国学应该研究什么问题，基本上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主张。后来的 神话-象征 学派算是找到了美国学研究的一个主题，但由于缺乏多学科工具共同努力，仅仅作为一种群体记忆和隐形文化，还难以称得上是完整的学术。至于晚近的亚文化多元化研究则更是盯住各个微观领域所积累的独白式呓语，冠之以理论研究显然是令人难以信服。

在研究方法上，美国学毫不忌讳地积极接受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仍然没有整合出一套适合美国学自身的合理的方法论体系。缺乏方法论等于缺乏学科前进的支柱，对理论和方法论的探寻是贯穿美国学运动的一条主线，[55]也形成了史密斯说提及的 原则性机会主义 路线，倡导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但迄今为止，文学和历史仍然是美国学的主导性方法论，对于其他学科方法的吸纳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学一直拒斥文学的影响，但文学仍然主导着美国学研究的方法论，人文学者们对于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历史学的材料和方法仍然重视不够，所谓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仍然遥遥无期。

在研究社群上，美国学具有根深蒂固的美国中心主义倾向，忽视非英文专业和非英文世界的贡献，忽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社会文化对美国学的贡献。长期以来，美国学受制于英文世界的局限，被视作是英国文化在北美的复制品。在美国，最早的美国学研究是由一些大学英语系和历史系的教师在 20 世纪初，这些教师不满意与美国大学课程设置中过于模仿欧洲模式，缺乏对 美国独特经历 的教学和研究。最早的美国学机构是 20 世纪 30 年代耶鲁大学教授斯坦利·T·威廉斯（Stanley T. Williams）开设的 美国思想与文明 课程以及两年后设立的第一个美国学系 历史、艺术与文学系 ，并授予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美国学博士学位。此后，虽然也有诸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建立了美国学的专业和系科，但基本上局限于美国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二战以后，尽管美国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裂痕也非常深刻，两者在战后的走向基本上是分道扬镳：社会科学太轻率地假定价值只能在社会经验、群体行为、机构以及作为社

会一般水平成员的人中间发现；当代文学批评也同样轻率地假定价值存在于社会之外，存在于远离我们真实经验的“荒原”以外的地方所产生的艺术作品中。[56]此种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相互抗拒整合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学研究的社群基础。相比之下，美国之外的美国学研究和非英语世界的美国学研究更是无法摆脱挫折感，美国研究最多是向本国介绍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展开原创性的理论研究。美国学之所以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兴起，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这头野象闯进了世界政治的丛林，人们不能再像以往冷眼旁观一位暴发户一样冷落美国，而是迫不得已地关注美国，以免在国际交往中身受其害。

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毋庸置疑地将美国学纳入复杂的世界联系之网，美国学不再囿于话语主导、资源约束和联系隔绝而被美国学界所垄断，美国学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57]从学界的反应来看，将非美国学者全面拉入美国学研究大军已经不是问题，我们必须将美国放置于复杂的全球背景之中，将美国学视为地区研究学术体系，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此种“批判性国际主义”意味着人们必须真正破除美国学术在美国学界的中心地位，并以新的模式、新的问题、新的评论对其进行挑战。[58]更重要的是，美国学研究已经意识到应该探索用全新的理论路径推进美国学，根据约翰·卡洛斯·罗的研究，他发现新的美国研究有四个理论路径：一是新的美国学已经成为比较主义的学科，比较文学领域的专家们已经向旧的世界文学范式发起挑战，推进所谓“后民族国家主义”的学科；二是各种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美国研究的探索，将对性别、性行为、少数族裔、阶级的批判同对美国民族国家主义的国内外控制的整体性分析联系起来，拓宽了美国学的新领域；三是后国家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对美国学的研究，注重对从属的、多元的文化学科进行研究，朝着一个更加“去中心”的模式方向发展；四是文化研究的整体主义路径，尽管面临不少对文化研究的抵制，仍有不少学者强调文化研究的智性意义，有利于克服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和例外主义的模式。[59]不难看出，美国学发展在总体上趋于细化、分化和专化，如何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形成美国学完善的学科体系，越来越成为美国学发展的紧迫要求。

美国学：中国意义

针对目前美国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困惑，系统地提出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进而为美国学的发展指明方向，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意图和作者的能力。然而，从中国美国学发展的需要和面临的问题出发，研究中国美国学的学科成长思路，却是本文为之努力的一个主题。

据资中筠先生考证,尽管在 100 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对美国产生了兴趣,但系统的、学术性的美国研究得以真正深入发展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事。[60]具有标志意义的是 1981 年 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并创办了内部发行的综合性月刊《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后来与 1989 年 1 月创办并公开发行了关于美国学的第一份专门杂志《美国研究》,成为美国学交流的最重要平台。后来,随着以科研为主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以教学为主的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交流中心以及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系列美国研究中心的建立,美国学在中国如火如荼地成长起来,包括美国史、美国政治与外交、美国哲学、美国经济、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美关系等一大批关于美国学的研究方向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确立,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从事美国学的研究人才,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美国问题研究的著述,成立了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美国经济学会、美国文学研究会、美国历史学会等众多专业研究社团,尤其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美国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尽管美国学在中国发展迅速,但不能说没有问题。资中筠、杨玉圣、孙哲、张立平等人的研究已经指出了中国美国学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课题研究领域不平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平衡、受政策驱动因素影响太强、低水平重复研究多、学术评价体系不完善、数据信息不完善等。[61]当然,所有这些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的美国学还处于初创阶段。不过,中国的美国学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还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仍然不是问题的本质。中国的美国学问题的本质在于学科定位不明确,与美国同行面临的问题类似,中国学界在学科定位上仍然对美国学众说纷纭,没有形成明确的学科共识,在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和怎样研究美国等问题上仍然十分模糊。目前,中国的美国学最大的问题是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在内的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在关注美国,但每个学科对美国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孤军作战,一盘散沙,缺乏学科之间的交流,难以形成共享学术资源、研究方法和开展学术批评、推进学术交流的局面。诚如杨玉圣教授所言,中国的美国学,归根结蒂,即中国学者从严格的学术视角对美国的过去和现在所作的系统阐释。这是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它关注过去、现在与未来,理应融以时代气息、中国特色和东方风格。[62]从这样的学术使命出发,惟有整合中国学术界所有学科的力量,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的美国学学科实现结构性提升,单靠任何一个学科的力量都无济于事。具体来说,中国的美国学学科发展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加强问题意识。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学术主题的界定和厘清,没有问题的研究是空洞无物和无的

放矢的研究，美国学也不例外。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美国学的对象是 与美国或美国人相关的，而且是对美国人的生活有特定意义的文化研究。 [63]凡是与美国和美国人相关的研究，均可纳入美国学研究的范畴。然而，此种宽泛意义上的美国研究基本上不具有学科建设的意义，无助于美国学的学科整合与学科发展，很容易滑入各个学科自成体系的专业体系中而难有大的作为。作为一门研究对象跨越学科边界的学问，美国学所涉及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丛，问题与问题之间相互勾连，纠缠不清，如果不从具体问题的角度明确问题的本质所在，很容易导致循环论证和自我独白，难以将问题解释清楚。

显然，强化问题意识要求美国学必须采取双重策略：首先，加强对具体问题的纯学理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问题的具体性中把握问题的一般性所在。比如在实践中我们会看到美国的劳工群体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非常不友好，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却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本质是为什么美国不欢迎社会主义？如果牢牢抓住这一问题不放，从具体问题入手，从各个角度展开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乃至综合研究，就必然导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般性理论和知识。德国学者 W·桑巴特、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等学者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得出了令学者瞩目的理论成果。 [64]其次，强化问题意识也要从一般意义上大胆提出假设，自我设定一些关于美国学的一般性研究议题，比如为什么美国与众不同？美国与众不同是如何可能的？美国人是如何可能的？美国国家是如何可能的？美国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中国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发展美国学的意义何在？所有这些问题都源自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主观的困惑，对这些困惑的解答，本身就是对美国学的一种探索。资中筠先生就提出，中国的美国研究或许可以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 [65]杨玉圣教授认为，中国美国学应该充分体现中国人缜密的、科学的美国观。 [66]孙哲教授则提出了中国美国学的 三个为了：为了能够在新的实际更好地处理好对美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统一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了能为我们自身的科学发展提供科学的镜鉴。 [67]尽管这些问题可能更多出自主观愿望，属于一些有待于验证的假设，但此种问题意识无疑是美国学发展重要的精神动力。无论验证的最终结果是证实抑或证伪，终究是对美国学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只要有问题的美国学研究，无论结果如何都应该是值得鼓励的，那种空洞无物、自说自话、重复他人的研究无论看上再超凡脱俗，都不过是一堆学术垃圾而已，对于美国学的发展毫无贡献。

二是淡化学科意识。

既然美国学的问题均是跨学科的问题，克服美国学研究困惑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淡化学科意识，围绕某一明确的问题打破学科限制，开展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挖掘多学科的资源

优势，共同致力于美国学的研发。无论是思想史的问题、社会史的问题、文学史的问题、艺术史的问题、物质文化的问题、种族的问题、性别的问题、还是妇女的问题，如果转换一下学科视角，完全可以看到传统学科所无法看到的学术景观。

以美国宗教研究为例，可以看出打破学科限制所产生的效力。美国宗教传统上属于思想史研究的领地，以派瑞·米勒的清教研究为代表。然而，美国宗教是高度世俗化的，各种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如果单纯从宗教教义分析的思想史或者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美国宗教，显然是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美国社会越世俗化，宗教越神圣化？为什么美国天主教和欧洲的天主教源出同宗却存在截然的差别？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能从单一的学科进行考察，必须综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甚至文学等众多学科工具，才能发展和繁荣美国宗教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对于同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这就是多学科研究的独特优势。

美国的美国学之所以蓬发发展，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美国学者不囿于传统的学科门户界限，积极借鉴或引进对自己有用的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创造性地开辟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新领域，从而使美国的美国研究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因此，要围绕核心问题，大力倡导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风气，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诚如孙有中教授所言，无论是人类学的、社会学、文学的、文化研究的、传播学的，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方法，只要用得着就拿来。 [68]

三是探索中层理论。

对美国学采取多学科互动的方法也具有一个消极后果，那就是各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很容易引发基于不同概念、逻辑、理论和方法的争论。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一学科间的张力，很容易造成美国学研究消化不良和自相矛盾的危险。不少美国学者已经指出了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之间存在的相互指责而非努力会师的问题。 [69]如何整合人文和社会之间的学术体系，将成为美国学发展未来面临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从弥合人文学科偏重价值判断和主观体验的“宏大理论”与社会学科偏重实证调查和客观确定的“微观理论”研究鸿沟的研究需要出发，突破美国学研究的一条可能的理论路径就是在宏大叙事与微观经验之间建立“中层理论”。“中层理论”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 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 (R. K. Merton)，所谓“中层理论”，是介于抽象的综合性理论同具体的经验性命题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是一种脱离抽象层次而力图接近经验事实的功能论，所以乔纳森·特纳又称之为“经验功能主义”。 [70]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其主要目的主要是指导经验研究，并能够通过

经验加以验证有限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它并不刻意寻求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和理论假说,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实证的方法寻求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途径和方案。

以中层理论为指导推动美国学,意味着在研究议题上侧重把握美国学中的元问题,亦即在宏观层面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美国与众不同?美国文化是如何可能的?美国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等等。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将原问题进行纵横向的分解,亦即从纵向上按照历史发展阶段的剧情重点划分为若干有操作可行性的“短时段”议题,从横向上按照所属于的领域区隔为便于不同学科方法实施的微观议题,从而形成一整套学术研究体系,从微观中洞悉宏观的秘密,从宏观关照微观的研究价值。如此一来,任何关于美国学的议题都变成了一个美国学研究的学术矩阵,不仅可以缓和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之间的内在张力,而且可以增进对美国学研究的整体性和专业化程度。这应当是学术界值得探索的新路径。

结论

本文分析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国学的成长及其对中国的意义,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明确中国美国学发展的方向。从普遍意义上讲,美国学是不分国界的,凡是采取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和方法从事的研究,无论出自哪一个国家之手,都可以汇入美国学的学科行列。在中国学界一度存在的将一切美国研究纳入批判视角和采取意识形态的机械眼光,是不足取的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中国美国学的未来只能坚持理性的、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巩固和提升美国学的基础,为美国学的学科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养分。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经历、基本国情、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方面与美国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美国学必定在学术目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必须正视而不回避此种差异,毫不隐讳地向国际学术界表达此种差异并阐释其合理性和独特的学术价值。中国的美国学必定服务于中国的国家目标和社会理想,服务于中国学的发展。美国学是美国的寻根之学,为美利坚民族确立立足根基,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美利坚民族的价值原则和社会理想,这些价值和理想有的也是中国的价值和理想,有的则未必。因此,中国的美国学必须有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未必一定要尾随美国学术界而亦步亦趋。

因此,中国的美国学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并在学科推进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个性,从而真正确立中国美国学的学科属性。要实现这一学科目标,首要的是正确地理解美国,毕竟美国对于中国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文明体,如何避免带着有色眼镜误读美国,如何避免先入为主地设定观察美国的前提,是中国美国学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只有客观地准确地理解美国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才能把握美国的未来。其次,理解美国的目的是为了镜鉴中国。

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又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既属于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又具有独特的国情和特殊的发展道路，作为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尽管并非美国的所有成功经验都适合中国，美国也有引人警醒的深刻教训，但没有美国这个参照系或者不研究美国这个参照系，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不负责任的。最后，归根结蒂，中国美国学的最终目的是寻找自我，为中华文明寻根立基，思考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泉和新生因素，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之路，这是中国美国学的最终理想，也是中国学界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
- [1] 张涛著：《美国学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446-447 页。
- [2] John Muthyala, "Reworlding America: 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Studies", *Cultural Critique*, No. 47, (Winter, 2001), pp. 91-119; Jane C. Desmond and Virginia R. Dominguez, "Resituating American Studies in a Critical Internationalism", *American Quarterly*, Vol. 48, No. 3 (Sep., 1996), pp. 475-490.
- [3] 蔡翠红、倪世雄，"'美国研究'或'对美国的研究'——试析中外美国研究的不对称性"，《社会科学》2005 年第 9 期，第 50-58 页。
- [4] 关于美国学概念界定方面的分歧，可以参阅如下相关文献：Robert Spiller,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e: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in Perspective," *American Quarterly*, Vol. 25, October 1973, pp.363-389; Robert Walker, ed., *American Studies Abroad*, Greenwood, 1975; Lucy Maddox, ed., *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 [5] 蔡翠红、倪世雄，"'美国研究'或'对美国的研究'——试析中外美国研究的不对称性"，《社会科学》2005 年第 9 期，第 50-58 页。
- [6] John F. Stephens,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An Overview," in *USIA, U. S. Society and Values*, October 1996.
- [7] 孙哲著：《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1 页。
- [8] Vernon Louis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Volume I :The Colonial Mind, 1620-1800,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7 .
- [9] Henry Smith,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in Lucy Maddox, ed., *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
- [10] Richard P. Horwitz ed., *The American Studies Anthology*,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2001, p.i-vi.
- [11] Robert E. Spiller, "American Stud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Kwiat and Turpie, eds., *Studies in American Culture*, p.213.
- [12] Richard Horwitz, ed., *Exporting America: Essays on American Studies Abroad*, New York, 1993.

- [13] Perry Miller,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 Harper , 1964); F. 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New York : Oxford Univ. Press , 1941) ,p. xv.
- [14] 参阅【美】约翰·卡洛斯·罗著，蔡新乐译：《美国研究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15] 张涛著：《美国学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30 页。
- [16] 孙有中，美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2006 年第 1 期。
- [17] 严维明主编：《比较美国学》，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 [18] F. 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vvi-xvi.
- [19] See Bruce Kuklick, "Myth and Symbol in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Vol. 24, No. 4, (Oct., 1972), pp. 435-450.
- [20] 【美】詹姆斯 W 西瑟著，竺乾威译：《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
- [21] Richard P. Horwitz, "American Studies: Approaches and Concepts," in George Kurian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Studies*, Bethel, Connecticut: Groli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22] See Vernon L.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0.
- [23] 转引自陈奔、陈洁菲，美国研究：一个历史的解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6 年第 4 期，第 28 页。
- [24] T. V. Reed, "Theory and Method in American Studies: A Bibliographic Essay,"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 Vol. 30, October , 1992.
- [25] Gene 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 A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American Quarterly* Vol.31, 1979, pp298-301.
- [26] 张涛著：《美国学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62 页。
- [27] Leo Marx, "Reflections on American Studies, Minnesota, and the 1950s", *American Studies*, Vol. 40, Summer 1999; John Higham, "The Ris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56, No. 3, April 1951, p.459.
- [28] Vernon L. Parrington, *The Beginnings of Critical Realism in American, 1860-1920*, in Vernon L.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0, pp.103-139.
- [29] F. 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230-239.
- [30] See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2; also see Murray G. Murphey, "Perry Miller and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Studies*, Vol.42, No.2, Summer 2001, p.5-18.
- [31] Gene 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 A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American Quarterly* Vol.31, 1979, pp.306-307.
- [32] 张涛，美国学研究中的主题演变，《美国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131 页。
- [33] 孙有中，美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2006 年第 1 期。
- [34]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93, pp.199-227.
- [35] Henry N.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New York: Vintage, 1950, p.123-24.
- [36] R. W. B. Lewis, *The America Adam: Innocence, 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1-20, 111.
- [37]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6.
- [38] *Ibid*, p.141.
- [39] Henry N. Smith,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in Lucy Maddox ed., *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p.1-11.
- [40] Gene 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 A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American Quarterly* Vol.31, 1979, pp.331-333.
- [41] Larry Griffin and Maria Tempenis, "Class,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American Quarterly,"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4, March 2002, pp.74-81.
- [42] Alan Trachtenberg,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pp.77-96.
- [43] David R. Roediger,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London: Verso, 1991, pp.14-15.
- [44] See Houston A. Baker, Jr., "Modernism and the Harlem Renaissance," in Lucy Maddox ed., *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p.269-272.
- [45] Ramon Gutierrez, "Community, Patriarchy and Individualism: The Politics of Chicano History and the Dream of Equality," in Lucy Maddox ed., *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p.354-370.
- [46]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1974; Betty Friedan,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Dell, 1981.
- [47]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78; C. Richard King ed., *Postcolonial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 [48] 【美】约翰·卡洛斯·罗著，蔡新乐译：《美国研究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 页。
- [49] 罗伯特·E·斯皮勒，*美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南京大学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编：《美国学译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 页。
- [50] Henry N. Smith,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in Lucy Maddox ed., *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p.1-12.
- [51] 参阅【美】约翰·卡洛斯·罗著，蔡新乐译：《美国研究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2-95 页。
- [52] 【美】萨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 - 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 [53] 罗伯特·E·斯皮勒，*美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南京大学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编：《美国学译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 页。
- [54] Henry N. Smith,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in Lucy Maddox ed., *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p.6.
- [55] 张涛著：《美国学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443 页。
- [56] Henry N. Smith,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in Lucy Maddox ed., *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p.1-11.
- [57] John Muthyala, "Reworlding America: 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Studies", *Cultural Critique*, No.47, Winter 2001, pp.91-119.

- [58] Jane C. Desmond and Virginia R. Dominguez, "Resituating American Studies in a Critical Internationalism", *American Quarterly*, Vol.48, September 1996, pp.477-485.
- [59] 【美】约翰·卡洛斯·罗著，蔡新乐译：《美国研究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5 页。
- [60] 资中筠，中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1987 年第 1 期，第 7 页。
- [61] 孙哲著：《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1-59 页。
- [62] 杨玉圣，八十年代的美国学 回顾与思考，《美国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155-156 页。
- [63] 蔡翠红、倪世雄，“‘美国研究’或‘对美国的研究’——试析中外美国研究的不对称性”，《社会科学》2005 年第 9 期，第 51 页。
- [64] 参阅[德]W 桑巴特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London: Norton, 1996.
- [65] 资中筠，中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1987 年第 1 期，第 18-19 页。
- [66] 杨玉圣，八十年代的美国学 回顾与思考，《美国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156 页。
- [67] 孙哲著：《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6 页。
- [68] 孙有中，美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28 页。
- [69] 参阅南京大学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编：《美国学译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70] 【美】乔纳森·特纳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 6 版（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